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新时代发展需求探微

■文/王晶 李梦洁

纵观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主旋律电影依然是当今中国电影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创作区间。

一、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简要梳理

中国电影自1905年的《定军山》诞生以来,第一代以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的电影人,诠释了什么叫做“影戏”,也诠释了影戏的教化功能作用。自此,中国电影的一大功能被定格:电影不仅是娱乐,不仅讲究商业性、艺术性,它还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劝恶扬善”,不得不说不,这恐怕是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在电影中的最早展现。

1920年代的旧中国,处于乱世。从电影创作者到电影接受者,都不再满足于“鸳鸯蝴蝶派”等武侠、神怪那些与现实社会极其边缘化的电影存在。这个时期,电影范畴内,展现出的正是承上启下的一派新态势。电影创作有了新的需求,它不再是仅满足于对电影商业化的主体追求,更不会止步于大众的封建教化的主体功能,电影是独立存在的“第七艺术”,它还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性功能意味。当“左翼文学”作家群体的建立成熟以后,“左翼电影”在1930年代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1932年,左翼电影人创办了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提出“现在的中国电影必定是被压迫民众的呼喊”。同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它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为指导思想,给今后的电影创作提出了“和整个社会文化运动协力前进”的目标。自此,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领导,以创作尤以反帝反封建为主体目标的“左翼电影”就此彻底出现。

当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的时候,中国电影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变化,产生一系列与时代、历史精神相呼应的电影作品。1936年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国内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方面。1936年1月27日,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费穆、孙瑜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同年5月又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经过讨论指出电影工作者应该以电影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日斗争服务。自此,以反映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下的各种现实生活问题、号召大众团结御侮的展现民族危机的“国防电影”就此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第三代导演为主创者的中国电影,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和展现作用。建国后的中国电影,从崇高的历史讲述层面,体现着新的历史认知,具体可以细化为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的讴歌、对共产党先进领导的颂扬和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歌颂三个主要方面。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经典的中国主旋律电影,如《翠岗红旗》、《南征北战》、《红孩子》、《党的儿女》、《红色娘子军》、《南海潮》、《卫国保家》、《闪闪的红星》、《董存瑞》、《回民支队》等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通过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不难发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之路,显得愈发清晰可见。

二、从票房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需求

电影自诞生之初,就在电影艺术性、商业性、教化性等方面游离着。

中国主旋律电影,尤其是1930年-1949年的电影,呈现出明显的革命阵地的价值功能。而到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电影”期间,中国电影出现了典型的计划经济和国营化的状况,体制下的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从制片、发行、放映,都是受到国家的分配而进行;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尤其是大陆电影,虽然有了很多优秀的、制作精良的电影出现,但是对于票房这一概念,老百姓貌似理解的还不够深刻,电影商业性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还不能很好地呈现在电影市场上。

曾几何时,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从艺术上、政治功能方面讲,虽然艺术技艺高超,在主流价值观方面有很好、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从商业票房角度看,并不占太多优势。时代在进步,电影的接受主体在变换,尤其当80后、90后、00后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票房的主力军之时,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制作、发行等一系列环节,必然需要考虑电影接受主体的需求和心理层面的认知变化。主旋律电影是否还能沿袭曾经的“英雄”式人物的高喊口号,是否还能枉顾受众意愿的“强加式”说教,是否还能老调重弹的“不够时尚”的表达,都是主旋律电影必须面对的问题和与时俱进的具体需求。

2009年《建国大业》的上映,除了主旋律电影的光环令人关注之外,其中的174位豪华明星演员阵容更是吸引眼球。作为当时的观众主体的70、80后们,看到这么多资深演员和明星们的强大表演阵容,不免成为了该电影票房的

主力军。这部制作成本仅为3000万元的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上映仅仅半天,中影就宣布该电影的全国半日票房突破了1500万!最终,该电影以4.2亿票房领跑当年年度国产电影,并成为仅次于电影《2012》和《变形金刚2》的票房季军!自此,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属性也在追随着电影的艺术性,稳步前行。接下来,主旋律电影《风声》、《南京!南京!》、《十月围城》等,也都获取了不俗的票房收益。到了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依然走着《建国大业》成功的明星牌,客观地讲,这种操作观众很买账,该电影当年票房依然超过4亿人民币,位列当年票房第七的好成绩。《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为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取得优秀的电影票房成绩开了个好头,逐渐形成了主旋律电影的“艺术性+商业性”几近完美的制作、运作模式。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合伙人》、《涓江河行动》、《建军大业》、《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你好,李焕英》、《金刚川》、《长津湖》等主旋律影片,既能够展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又能从电影的投入、产出,制片成本、票房收益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可谓共赢的典型案例。从电影接受主体的角度来看,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00后,都十分认同近几年的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故事内容和制片方向,这种形式的主旋律电影,早已打破传统红色主旋律电影的方式。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将电影的艺术性、商业性、娱乐性、大众性等属性融合,让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有了新的发展需求和新的创作道路。

结语:

以史为轴,以史论今,从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主旋律电影必然是中国电影中的重头戏。新时代,电影工作者如何能够让主旋律电影更接地气、更适应市场需要、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审美口味,从电影商业性和艺术性、电影个性化和共性化、电影娱乐性和教化性等“二元论”的角度出发,探索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讲好中国故事,在新时期的电影之路上,走出一条更深远的大道。

(王晶系四川传媒学院电影学院讲师,李梦洁系四川传媒学院戏剧艺术学院讲师)

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教育功能

■文/黎玲花 尚悦

主旋律电影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注重对于人性的把握,引导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对民众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主旋律电影主要包括红色电影和主导文化电影两种类型,红色电影以中国在革命时期的反侵略战争为背景,目的是为了增强民众的爱国热情,使其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主旋律电影顾名思义是为了展现出电影的道德性和社会性,该类电影主要对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进行了探讨,进而不断发挥出电影的意识形态导向作用。

一、主旋律电影引领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够推动我党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使民众深刻认同党的伟大斗争,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对于现代民众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普世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各种不良舆论逐渐渗透到国内,对于一些价值观尚未成熟的民众而言,很容易导致其思想、政治信念的崩塌。因此,必须强化对于现代民众的思想教育,使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更好地引导其为社会服务。主旋律电影以其强烈的叙述性和情感感,通过文学艺术手段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在潜移默化中对民众的政治方向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

正确政治方向的引领以弘扬爱国主义为主体,主旋律电影当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能够进一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进而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主旋律电影刻画了不同时期的国家形象,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个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国家形象,讲述了不一样的家国故事。主旋律电影以某一重点历史时期为背景,讲述了这一时期的重点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见证了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而不断提高了大众的爱国热情。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地雷战》、《英雄儿女》作为我国第一批主旋律电影,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反抗法西斯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再如2019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一共分为七个小的章节,每一章节都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其重要的政治背景,该电影以小人物的视角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的重大变化,展示出了新时代的国家形象。

二、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导向功能

正确的价值观能够提升民众的思想素质,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对现代民众而言,主旋律电影能够起到正确的价值导向作用。主旋律电影要充分发挥它的价值导向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中所蕴含的正确的价值观以一种更加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来,从而不断提升民众的思想素质建设。

例如电影《焦裕禄》就塑造了一个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党员形象,民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能够深刻体会到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此外主旋律电影还进一步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这类型的主旋律电影通过再现历史史实,刻画历史人物形象,从而弘扬了社会正能量,起到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作用。例如在《涓江河行动》、《黄大年》、《战狼2》、《红海行动》、《攀登者》等影片中体现出来的热爱祖国、爱好和平、无私奉献、勇攀高峰、不畏艰难、护国保民的精神都进一步践行和宣扬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上营造起一种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能够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思想境界,维护社会稳定,进而不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有效减少社会矛盾冲突的出现。

三、主旋律电影的道德净化作用

主旋律电影反映了社会的真善美,作为价值引导、道德宣传的主阵地,主旋律电影从始至终都坚持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对于“真”而言,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里的“真”代表了客观现实的真,例如一些主旋律电影是以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进行的艺术发展进程,进而不断提高了大众的爱国热情。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地雷战》、《英雄儿女》作为我国第一批主旋律电影,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反抗法西斯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再如2019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一共分为七个小的章节,每一章节都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其重要的政治背景,该电影以小人物的视角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的重大变化,展示出了新时代的国家形象。

中印儿童教育题材影片的比较研究

■文/薛慧敏

现有的教育体制进行反思。

中国当代儿童教育题材影片,虽然同样涉及到对教育资源的关注和思考,但主要是围绕着贫困阶层教育来展现当前教育体制的漏洞和缺失。例如由张艺谋导演的儿童教育题材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就将叙述视角放置在中国北方乡村,因为教育体制的不完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里的儿童出现了很多的失学状况。在这部电影中,影片选取的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也是将生活的真实一隅原原本本的展示给观众。除此之外,无论是影片《孩子王》,亦或者是《水凤凰》,都和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一样,将创作主题涉及到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以及教育体制的关注上。当前的中国儿童教育题材电影将教育体制的匮乏和缺失作为一种个性化的形象表达,全方位展现贫困地区当前所存在的教育体制问题,让观众从情感感染中去感悟贫困儿童的日常艰辛,从现实层面分析具有很好的社会意识表达。

社会问题的展示和呈现。阿米尔·汗作为印度电影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在他所参演的系列影片当中,尤其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冷静思考,在强调影片真实

的同时,致力于从中寻找永恒不变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由阿米尔·汗参与主演的众多影片中,《三傻大闹宝莱坞》对现有的体制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神秘巨星》以及《摔跤吧!爸爸》给予女性身份和地位的尊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印度女性意识的崛起。阿米尔·汗所参与指导的这类影片,都带有关于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冷静思考,更是从底层人物的发展困境上上升到对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担忧和焦虑,影片中随处可见的底层人物的生存窘境,都是对印度社会的真实写照和形象化表达。

中国的成人电影已经迈入了全新的发展时代,却很少有导演将目光触碰到儿童教育问题,甚至考虑到由此折射出来的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值得肯定的是,当前有关中国的儿童教育题材影片虽然数目较少,但都或多或少的反映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状。例如《悲伤逆流成河》是从校园暴力的角度解析学生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求学困境;电影《留守儿童》是以留守儿童为影片的叙述主人公,通过展示人物的教育环境和所处的生存状态来反映当下的社会问题;2000年上映的影片《背起爸爸上学》,更是从儿童教育的层面上

升到对传统孝道的审视和思考。影片采用平淡写实的叙事策略对农村地区儿童的教学环境和所面临的家庭生活窘境进行了全方位揭示,尤其是涉猎到边缘人物的一系列现实生存问题,电影中所传递出来的教化作用更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透过故事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反思自身所处的家庭地位。

人物设定的差异化比较

长期以来,印度教育深受等级观念和性别差异的影响,女性始终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地位,由此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和服务工具。特别是对当下女性儿童来说,她们的出身,除了给男性场域增添麻烦之外,无法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价值。印度教育反其道行之,重点突出儿童在影片中的主体性地位,对现有的家庭教育和教育理念进行深入的思索,并指明普遍性的社会教育问题。电影《神秘巨星》从儿童主人公尹希娅的视角来看待母亲和自身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地位。《神秘巨星》在塑造尹希娅人物的过程中,也将视角触及到印度男女地位不平衡的社会现状,父母的家庭所属地位会对子女的教育产生极为重要的影

响,从男女地位差异化的角度对影片文本进行分析,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尽管中国的儿童教育题材影片并不缺少学生这一标志性主体,但却被当做统一的一个叙事符号,展现的是群体性的生活状态,人物的性格魅力始终得不到有效凸显。影片《凤凰琴》当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虽然被赋予了基本的姓名和身份,却没有重点突出他们的个性化特征,只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以及渲染主题而展开的单纯意义上的描述;同时中国教育电影中所涉及到的众多儿童形象,大多都属于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好学生,很少有涉及到那些被边缘化的受教育者,使得中国的儿童题材影片人物形象塑造较为单一,缺乏更为形象立体的圆形人物。

风格特征的个性化比较

印度商业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采用的是“马沙拉式”的电影创作模式,但因为脱离现实的极端梦幻化色彩,叙事策略的随意化表达,在电影行业领域掀起了极大的质疑和抨击。阿米尔·汗作为印度儿童教育电影的突出代表人物,创造出了“反马沙拉式”的电影创作形

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热爱人民、鞠躬尽瘁的孔繁森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身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学习孔繁森精神,真正做到为民服务解难题,做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身为普通民众,也要学习孔繁森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同时也要学会主动帮助他人,构建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共建美好社会的目的。针对“美”而言,一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民理想信念教育、促使大众树立正确政治信仰、影响大众思维观念、传递正能量的内容都是美的。因此要加强对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甄别和筛选,自觉摒弃娱乐性强而教育性不足的电影,用主旋律电影中蕴含的道德内涵不断提升大众的道德素质。

四、主旋律电影的审美教育功能

审美能力的提升一定离不开艺术创作,而电影就是艺术创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观众能够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直观刺激来提高自身的审美情操,无论是电影角色、电影服装还是电影背景的选择,都能够使得观众得到艺术上的熏陶,进而提升其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就审美教育功能而言,主旋律电影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风貌,尤其在当下,主旋律电影以更加适合当代人的审美而有了新时期的表达方式,在注重宏观主题表达的同时,更加贴近民众、走向生活,主要从小人物出发,通过对个人形象的刻画,以小见大,进而展现出宏大的主题。此外,主旋律电影的审美教育功能还体现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对于时代背景的再现。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审美,主旋律电影能够通过再现当时的生活情境,展示出这一时期的审美倾向,从而为现代民众的审美情操带来积极的影响。例如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为例,这一章主要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排夺冠为历史背景,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回顾了1984年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大赛三连冠的历史瞬间,镜头聚焦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身上,以小见大,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同时,电影中还强化了对细节的刻画,从人物穿着到弄堂样貌,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老上海弄堂风情,这也正体现了当代主旋律电影在审美表达上的一种追求。

(黎玲花系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尚悦系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达载体,除了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娱乐化诉求,也应该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儿童教育题材影片作为反映国家社会形状的具体化呈现,既承担着观影者释放情感的娱乐化重任,又需要从故事情节的冷静审视中完成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层性思考。

主题立意的客观化比较

中国电影和印度电影在关于主题立意具体的叙事模式上,二者则存在很明显的不同之处。

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漏洞。印度电影是从所谓的精英教育中讽刺现实社会,尤其是针对现有的体制教育,通过对当前不合理教育资源的揭露,从而引发社会成员的集体抨击,并对当下的教育政策进行实质性探究。例如影片《起跑线》讲述的就是有关城市中产阶级的教育故事,通过来图一家三口的教育环境升迁,探讨名校对普通学生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此外,《三傻大闹宝莱坞》虽讲述的是成年人的教学故事,同样反衬出教育体制的缺失和漏洞。影片将叙事环境设置在以培养精英分子为目标的高级院校,但所传递的教学理念却是绝对的服从和命令,而两位主人公从不同的层面对现有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反抗。无论是《起跑线》还是《三傻大闹宝莱坞》,都是从精英教育的角度对印度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j@163.com jxsp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